

本译稿原定载于《公共政策与治理》杂志，后因未通过审查而撤稿。

本版本未经校对，仅供参考。

变迁社会中的国际知识与国内态度

——以中国为例

黄海峰 著 袁 智* 译

摘 要：有关外国的知识和信息会影响人们对本国的态度吗？本研究通过运用独特的调查和实验数据发现，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越正面，特别是高估外国状况的中国民众，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评价越低。此外，纠正对外国社会经济的错误认知会提高对中国的评价，这意味着在因果关系上对国外情况乐观的估计会导致对国内较低的评价。一般性国际政治知识（即有关外国政治事务和人物的知识）与国内态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对其他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了解能提高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这些结果在实质上和概念上都有助于对与政治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的研究，并进一步揭示变迁社会中信息流动与观念形成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外国知识 本国态度 调查 实验 评价

1 引言

至少从 Stouffer 等人（1949）的相对剥夺理论以及 Festinger（1954）的社会比较理论开

作者简介：美国加州大学默赛德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Email: hhuang24@ucmerced.edu。我非常感谢 Tom Hansford、Kent Jennings、Steve Nicholson 和 Yao-Yuan Yeh 极其宝贵的讨论，以及 Li Zhi、He Junzhi 和 Shen Yi 在大学调查和试调中的帮助。我还要感谢 APSR 的主编，四位匿名评审人、Serra Boranbay、John James Kennedy、Jie Lu、Xiaobo Lu Susan Shirk 和 Tao Xie 的评论和建议，感谢 Hellman Fellows 基金会和加州大学亚太研究项目给予的支持，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 世纪中国”项目于 2013 年夏季的盛情邀请。本文初稿在 MPSA, ISA, ACPS 和 Fudan-UC Center 会议中曾报告过。原英文出处为“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2015): 613 - 634

*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Email: yuanz008@163.com。

始,众所周知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看法起码部分地是在与其他人的比较中形成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表明,增加所有社会成员的收入并不能带来所有成员幸福感长久的增加,因为个体的幸福感受并不只建立在客观生存状态之上,还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Easterlin, 1995)。标尺竞争文献则显示政府官员们通过观察相互的行为来进行竞争,因为选民是通过与其他辖区的比较来判断当地官员的表现(Besley & Case, 1995)的。更近些的研究则表明全国性选举中选民对当政者政绩的判断同样是基于本国经济与世界形势的比较而非孤立地只看本国情况如何(Duch & Stevenson, 2008; Kayser & Peress, 2012)。

虽然上述研究已经发现相对表现在人们评量自己和政府时作用突出,但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预设是人们拥有正确的信息来进行比较。例如,为了进行国际性比较,我们需要知道其他国家的状况。但是人们往往对自己国家基本的政策和社会经济事实持有很不准确的信息(Gilens, 2001; Kuklinski et al., 2000);对外国的认知错误恐怕会更加普遍和严重。2011年至今,盖洛普世界事务年度调查一直显示大部分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其中2014年回答中国和美国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52%和31%(Dugan, 2014)。^①皮尤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全球态度调查的结果与此相似,比如2013年的调查表明,在美国、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最多比例的受访者甚至大多数受访者都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Pew Research Center, 2013)。很显然,相当比例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众都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如果在美国这样的信息环境公开、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民主国家,民众对外国都会有如此误解,那么在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个人对外国的直接接触(如海外旅游)更少、媒体与信息流动更不可靠发展中的威权制国家如中国,民众也可能严重地误解外面的世界。这些误解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威权制发展中国家,人们可能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国家与外国尤其是发达民主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他们可能会低估其他国家。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鼓励官员们出国看看中国落后外国有多远,以此获取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Vogel, 2011)。同时,如果没有充分和准确的信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也可能对外面的世界有过分浪漫的看法,而不能认识到外国也有外国的问题,或者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并非他们想象中那么高;换言之,他们可能会高估外国。中国的社交媒体如很流行的微博平台上就充满了把外国描述得过于美妙但实际上误导人的故事(Want China Times, 2013; Yung, 2011)。

民众对外国的知识与信息会怎样影响他们对本国状况的评价?纠正对外国社会经

^① 以汇率衡量,2013年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55%。参见2014年世界发展指数,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济的错误认知能否导致人们对本国的态度发生变化?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做了两项关于国际性政治知识及社会经济信息^②与人们对本国评价的关系的研究: 第一是在中国一所排名中上的大学针对学生所做的调查, 第二是对一群具有广泛社会人口特征背景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所做的在线调查。

研究 1 显示, 一方面, 那些对外国有更正面认知尤其是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中国民众对中国与中国政府和政治体制的评价更低; 另一方面, 具有一般性国际政治知识与人们对本国的看法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种国际政治知识在本文中是指对政治事务和人物的了解。

研究 2 进一步验证了研究 1 的结果并显示, 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更正面的认知与更低的国内评价之间存在从前者到后者的因果关系, 因为纠正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错误认知会提高他们对中国的评价。研究 2 还显示, 对国外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乱越了解的人对本国的评价越正面。

首先, 本文的结果除了在实质上和概念上有助于对与政治有关的知识进行研究外, 还揭示了威权制发展中国家中的公共舆论和反现状情绪里的一些微妙之处。首先, 对于包括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 传统观点与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公民的政治困境, 在这方面本研究显示, 至少就国际知识与信息的影响来说, 人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期望总体上超过政治上的不满。本文的一个隐含结果, 即中国的老百姓认为政治稳定很重要, 也佐证了这一发现, 因为稳定偏好与社会经济发展愿景之间的联系胜过其与追求政治赋权之间的联系。

其次, 本研究揭示了威权体制下影响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新的民意来源。对威权国家政治信任与政治支持的研究一直专注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绩效 (Duch, 1993; Rose, Mishler & Munro, 2011; Zhao, 2009), 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教化 (Geddes 和 Zaller, 1989; Kenez, 1985), 物质利益分配 (Blaydes, 2010; Magaloni, 2006), 以及文化和政治价值诸如民族主义, 民主取向和对权威的尊重 (Chen, 2004; Shi, 2001; Tang, 2005)。除了直接以提供物质利益来换取支持外, 上述大多数因素都涉及公众对政府和国家成就的认知, 由此也与人们对其他国家相关情况的了解相关。但是这种知识与信息很少在文献中得到分析。如前所述, 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常被置于国家间的比较中进行。民族主义和其他政治情感也会受到关于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的影响。此前的文献已经讨论过相对绩效对公众如何评价当政者的影响, 但此种相对绩效局限于同一国家中不同政权间的比较 (Rose, Mishler 和 Haerpfer, 1998; Rose,

^② 文中所指的国际性知识与信息是指有关外国国内形势的知识、信息以及认知, 而不是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国际关系。

Mishler 和 Munro, 2011), 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较。

最后, 关于宣传和信息控制, 通常认为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 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对外部信息流入的控制和为美化国内形势所做的政治宣传。因此传统观点认为, 如果这些国家的民众能够获得更多有关外国的信息, 他们将对现状更加不满甚至可能对政府采取行动。传统看法当然有其道理, 因为被政府的宣传和灌输所影响或简单地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人们确实会低估外国。但是本文的研究显示, 在那些像中国这样经历快速社会变迁的国家中, 相反的事情也会发生: 相当一部分人对外国的认知不是过于负面而是过于浪漫; 更准确的信息实际上能降低民众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据此, 对来自国外的信息进行审查控制有可能适得其反 (Huang & Yeh, 2015)。托克维尔所言之“对于一个坏政府, 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当它开始变革时”或许在当今世界包含了某些信息方面的内容。当一个以前封闭的社会开始开放时, 公众将会有限度地获得一些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但一知半解是危险的, 因为它可能导致人们过分浪漫的想象, 并将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身处他国时可能的情况进行不切实际的比较。这种“虚假意识”非但不能稳定现状, 实际上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不满。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社会里, 更加充分和准确的信息流动可能不会削弱而会延长威权体制的有效时间。

2 国际性政治知识、社会经济信息与本国评价

信息对于政治参与和决策而言至关重要, 因此政治学上对公众的知识和信息有大量的研究 (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Lupia & McCubbins, 1998; Nicholson, 2003; Prior, 2007; Zaller, 1992)。但除了少量值得注意的例外 (Gilens, 2001; Kuklinski et al., 2000; Heithington, 1996), 这些文献主要关注政治事务方面的知识 (且大多是国内政治事务), 如政治机构、过程、参与者和议题, 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知识。而且,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众知识, 以至于文献中出现了如下论断: “当代政治最为确凿地记录下来一个特征就是美国选民对政治的无知。” (Bartels, 1996)

有关外国政治事务的知识是国际性知识的重要部分。了解外国的政治能让人们更加清楚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过程, 并与自己国家进行比较。但关于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信息和认知也是国际性知识的关键部分, 也会对人们评量自己国家产生影响。实际上, 不少轶事证据显示, 在从越南 (Lam, 2006) 到俄国 (Barry, 2012) 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中, 民众对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兴趣常常超过了其对政治事务的兴趣。对于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言, 这两种知识对判断

本国的情形都有潜在的价值。

社会经济信息必须与政治知识区分开来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涉及不同的领域，而且是因为二者信息方面的错误大相径庭。有关政治知识的文献着重比较信息有无之间的区别，例如某人知道或不知道某一事物。对某事物有错误信息通常与不了解该事物归为一类。这对于政治事务知识是可行的。举例来说，虽然理论上不知道当前英国首相是谁与错误地以为某人担任该职有区别，但实际上很难说清这两种错误有何不同后果，也很难在测量上给这两种不同的错误打不同的分。

但对于社会经济问题，持有不正确的信息和不持有相关信息则有完全不同的意涵 (Kuklinski et al., 2000)，而且不同种类的错误在概念上与实践中均可区分开来。例如，人们可能会错误地大幅高估或低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而错误地高估还是低估对其观点的形成颇有影响。而且，即使人们并不清楚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具体是多少，他们仍然会有隐含且有意义的估计（即使估计得比较模糊），这种情况与猜测英国首相的名字很不一样。因此，对于社会经济知识，最相关的分类不是知道与不知道，而是一个人对于某种状况的认知有多正面或多负面。

关于威权制国家中公民的知识与观点形成的研究非常少，^③ 更别谈有关外国的知识与信息了。此种状况令人惊讶，因为影响民众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他们认为在别的制度或环境下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 (Meirowitz & Tucker, 2013; Shadmehr & Bernhardt, 2011)。特别地，Meirowitz 和 Tucker (2013) 认为增加有关所有潜在政府的信息并降低对政府的预期有可能导致公众接受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政府。变迁社会中对生活充满期盼的公民衡量自己国家的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外国尤其是发达民主国家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当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发紧密的时候。

作为政治学上对国际性知识和认知与本国评价之间关系的首次研究，本文着重关注的是信息与认知的实证影响，而非导致不同个体身处不同信息环境并形成不同看法的社会或心理机制，这与 Kayser 与 Peress (2012) 对选举参照的研究类似。但应该注意的是，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巨变已经导致“普力夺公共领域”的出现 (Praetorian Public Sphere) (Lynch, 1999)，即社会中充满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信息，有来自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境外的，其中也包括中国活跃和喧嚣的互联网 (Huang, forthcoming)。在此环境下，不实信息并不鲜见。即使是人们一般以为只会报道亲政府信息的官方媒体，其实际报道有时候也颇令人惊讶。例如，一则出自中央电视台的广

^③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Geddes 和 Zaller (1989) 所做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巴西威权制时期该国民众有关国内政治事务的知识。

受关注的报道称赞底特律房价的低廉（那里的住房跟“一双鞋一样便宜”），却忽视这座城市所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及其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这则报道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对底特律的浮想以及对移民的渴望（Bildner, 2013; *Want China Times*, 2013）。^④ 本文下面所引用的大学调查和线上调查分别显示有 57.2% 和 61.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日常生活中所获关于外国的各种信息至少部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中国民众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而他们偶获的零碎信息将可能塑造他们对外国的认知，并进而影响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评价。

本研究通过让受访者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一些重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指数上的表现如何进行估计来测量他们有关外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和认知，包括个人收入水平、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公共安全等（详见下节）。这种方法颇能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对西方国家生活的认知。为了测量受访者对外国政治知识的了解，一种潜在的办法是模拟对社会经济认知的测量，让受访者对经合组织国家的民主、新闻自由和人权保护等的水平进行估计。但与诸如人均收入这样的社会经济指标不同的是，这些政治概念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判断，所以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测量方法（Coppedge & Gerring, 2011）。于是，清晰和客观地评估受访者对这些政治问题做出的回答是困难的。因此，针对政治性知识，本研究遵循标准做法，询问受访者一系列有关世界各国政治事件和人物的问题。此种方法易于操作，而且因为某种程度上人们都是信息通识者（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所以那些拥有更多外国政治事务知识的人也应该更加了解外国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或者中国与发达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

因为本研究的理论预设是人们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评价会受到自己对他国与本国之间差别的认知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相对剥夺理论（Stouffer et al., 1949）与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提出了一些简单但是迄今为止很少得到检验的假设。这些理论认为人对客观条件的反应取决于其主观比较，尤其是当人们将自己与处境更优的人进行“向上对比”时会经常产生对自身更负面的评价和情绪（Smith, 2000; Wheeler & Miyake, 1992）。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包括那些低估了外国的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国家落后于发达民主国家。即使在朝鲜这个或许是全世界最为封闭的国度，人们也知道美国和韩国至少有着更好的物质生活（Myers, 2010）。因此，本文对社会经济认知的实证操作不是将中国民众中认为西方国家优于中国与认为西方不如中国的群体进行

^④ 另一个例子是，某很受欢迎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 2011 年作为一名委员参加备受关注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曾作出如下评论：“我们的话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个该收，哪个不该收？美国洛杉矶的手机收费标准是 9.9 美元，包打一年，你们相信不？”他后来为此言论致歉；参见 <http://news.163.com/11/0308/03/6UJCJMM0001124J.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比较, 因为后一类群体的人数很少, 而是就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持不同认知的群体进行比较。换言之, 这些群体可能都同意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 但是对其中差距到底多大持不同的认知, 而此种不同的认知可能影响他们对本国的态度。

于是, 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 即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更正面, 特别是那些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人, 会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持有更低的评价。同时, 本文亦假设个人对外国的常规政治事务 (而非政治和社会动荡) 的了解与本国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H2)。这是因为, 正如许多研究显示的那样, 中国民众对外国的痴迷更多地源于对这些国家经济繁荣、科学与科技, 以及时尚文化的印象, 而不是政治 (Dong, Wang & Dekker, 2013; Johnston & Stockmann, 2007; Shi, Lu & Aldrich, 2011), 而这表明他们优先考虑社会经济情况而非政治因素。这两个假设是下述研究 1 关注的焦点。

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将在研究 2 中得到检验) 则是对外国社会经济更正面的认知与更低的本国评价之间的因果方向至少部分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这意味着纠正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错误认知将会提升人们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态度, 尤其是对于那些高估了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人来说 (H3)。最后, 因为中国公众对政治稳定有着众所周知的偏好 (Chen, 2004; Dickson, Shen 和 Yan, 2013), 那些更为熟知外国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乱情况的人会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有更正面的评价 (H4)。这种对政治稳定的偏好部分源于中国动荡的充满战乱、革命和政治运动的现代史, 亦可能因为发展中国的人民常优先考虑社会经济之福祉, 而稳定有利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是其前提。所以, 上述假设是相互联系的。^⑤

在此可以比较一下本文与那些探究影响人们对外国“印象”的权力结构、社会心理和信息等决定性因素, 以及此种形象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研究 (Herrmann 和 Fischerkeller, 1995; Herrmann et al., 1997; Mannheim & Albritton, 1984)。在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中, 最近一项在六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检验了上述因素在塑造中国城市居民对欧盟态度上的影响, 调查表明这些居民的态度和潜在认知大部分基于新闻、网络以及其他二手信息 (Dong, Wang & Dekker, 2013, 特别是 Dekker 和 van der Noll 合写的那一章所述)。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则考察中国百姓和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观念和意见 (Johnston 和 Stockmann, 2007; Shambaugh, 1993; Shi, Lu & Aldrich, 2011), 以及对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看法 (Han & Zweig, 2010; Johnston, 2004; Li, 2010)。也有少量文献反过来分析美国公众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的决定因素

^⑤ 本文并不分析纠正对政治知识问题的错误回答带来的影响。与外国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不同, 很难想象告知人们现任英国首相是大卫·卡梅隆而不是戈登·布朗, 或者是在乌克兰而不是格鲁吉亚, 那些要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街头示威者最终推翻了该国总统, 会对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带来什么变化。

(Aldrich, Lu & Liu, 2015; Gries, Crowson & Cai, 2011; Page & Xie, 2010)。

本文虽然与上述研究有联系,但还是有显著不同。最重要的是,上述研究的因变量是人们对外国的态度,而本文的因变量是人们对自已国家和政府的评价。而且,本文也并未将前述研究的因变量作为本文的自变量。本文对民众对外国的认知所感兴趣的是事实性信息,而非主观态度或评价。因此前述研究有关民众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和印象的决定因素之理论探讨不能移植于本文。另外,虽然那些研究某种程度上也考虑了国际性信息与知识的影响,但它们大多使用的是间接测量方法,如教育和与媒体接触的程度,而不是直接测量人们有关外国的客观知识,特别是社会经济知识。Dong, Wang 和 Dekker's (2013) 的研究在这方面是少见的例外,他们测量了受访者关于欧盟的客观知识,但着重于一般性知识和政治性知识(如欧盟成员国、欧盟总部等),而不是对欧盟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⑥ 上述一些研究也考虑过出境旅游,但是由于中国有海外旅游经历的公民人数相对较少,因而该变量不能反映大部分中国民众在国际性信息和认知方面的差异。

3 研究1: 大学调查

3.1 数据与测量

研究1使用的是2011年6月在中国东部某大学调查所获数据。受访者是参加某门全校性必修课程的大二学生,调查以课程活动的形式进行,学生匿名(并自愿)参加。大约每两个班级中有一个参加调查,因此调查覆盖了全校除部分小专业以外所有专业。这所大学是一所中等规模、排名中上的学校,这使本次调查的参加者相比那些精英大学的学生更能代表普通中国大学生。正式调查中总计有超过1200名学生参与,在另外进行的试调中,不少学生表示调查问题很“有趣”、很“新鲜”,这解释了正式调查的高完成率。但不是所有同学都回答了所有问题,所以下面的统计表里样本数并不恒定。但由于该大学调查的结果又为随后的由不同样本构成的在线调查实验所复制,所以大学调查中少量缺失的回答并不要紧。

调查首先询问了受访者对中国的各项评价(因变量)和一些其他的态度性问题。接着按顺序询问两组问题,分别测量他们的国际政治知识与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自变量)。受访者对中国的评价包括当前整体现状^⑦、发展前景^⑧、政府

^⑥ 他们确实询问了受访者在诸如就业和社会福利这些社会经济领域是欧盟还是中国更好,但这与测量受访者对欧洲具体发展水平的认知是有区别的,因此不能准确地揭示中国民众对欧洲的认知的差异。实际上,他们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93%)认为欧洲的整体条件优于中国(Dekker与van der Noll, 2013)。

^⑦ 问题表述:“你对当前中国的整体情况有多满意?”

^⑧ “你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有多乐观?”

回应性^⑨、政治体制^⑩和腐败严重程度^⑪。除了关于腐败的问题外，受访者的回答均使用五分的里克特量表，其中分数越高意味着评价越正面。对腐败问题的回答则是用六分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意味着认为腐败越严重。

为了测量受访者的国际政治知识，调查询问了从2010~2011年前期的一些主要国际事件，如2010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奥巴马的医疗卫生改革、本·拉登之死、阿拉伯之春、波兰总统专机坠毁，以及关于几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性人物，包括英国首相、委内瑞拉总统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的问题。^⑫ 进行国际政治知识测量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方法或代表性问题，但是本次调查中的问题涵盖了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议题，因此是一组合理的问题。本文遵循标准做法，以受访者回答问题正确的数量来计算他们的政治知识分数。除了有关“阿拉伯之春”的那道问题，大学调查中的政治知识题并不直接牵涉政治不稳定或社会动荡。

调查中有关社会经济信息和认知的问题则要求受访者对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均个人收入、失业率、预期寿命、收入不平等程度、受教育年数、住房自有率、空气与水污染以及他杀率进行估计。问题侧重美国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美国往往是被默认用来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用什么问题测量社会经济知识显然也不存在标准的程式。但是本次调查中的八个社会经济问题都涉及生活质量的重要层面，亦是中国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因此是一组能测量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的有效问题。为了给受访者一些判断的基础，部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⑬ 这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正确答案均取自于当时最新的（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和美国的官方数据。

这些社会经济状况问题的特征是其选项可以根据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进行排序。例如，调查中一个关于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典型问题是下列哪个数字与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最接近：(a) \$ 15 000, (b) \$ 40 000, (c) \$ 65 000, (d) \$ 90

⑨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总体上我们的政府在为人民服务并回应人民的要求。”

⑩ “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适合我国吗？”

⑪ 在此问中，受访者被告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腐败水平作出年度排名，然后问他们认为中国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哪个位置。选项是(a) 1~30, (b) 31~60, (c) 61~90, (d) 91~120, (e) 121~150, (f) 151~178；数字越大表示腐败越严重。因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在中国并非被广泛知晓，所以受访者的回答能够反映出他们对腐败程度的看法。

⑫ 在线附录包括了国际性知识问题的完整清单。

⑬ 将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放于部分社会经济问题中的理由是：诸如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这样的问题有点抽象，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普通人能够清楚某一水平的基尼系数具体代表什么。就算是住房自有率、因污染导致的百万人口死亡率以及十万人口他杀率这样的问题，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参照点也很难判断某个数据是高还是低。因此，如果不提供参照信息的话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会包含高度的随机性，这会给测量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与国内评价之间的关系造成困难。

000。正确答案是 (b),^⑭ 其他均为错误,但是错误的方向并不一样。答案 (a) 低估了美国的收入水平,答案 (c) 高估了美国的收入水平,答案 (d) 则高估地更多。另外一个问题是下列数字中哪一个最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a) 72.3, (b) 76.3, (c) 80.3, (d) 84.3。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正确答案是 (c); 答案 (a) 和 (b) 均低估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而答案 (d) 则高估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

对于每个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调查都提供了四个选项作为备选答案。^⑮ 相邻选项间都有明显区别,但所有选项都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可能的。为了防止选项结构本身导致受访者高估或者低估西方国家,调查将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正确答案都设为 (b) 或 (c) 这两个中间选项,以防止受访者只在某个特定方向上出错。此外,半数的社会经济问题将选项中第二好的数字作为正确答案,另外半数则将第三好的数字作为正确答案,因此受访者高估或者低估的机会是均等的。为了构建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分数,每个正确答案赋值为 0,与正确答案相邻但高估(低估)西方国家的选项则赋值为 1(-1),高估(低估)更多的选项则赋值为 2(-2)。^⑯ 每个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的总分是八个问题得分的总和。得分为 0 表示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与实际情况相比在总体上是平衡一致的,正(负)分则表示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估计总体上好(差)于实际情况。^⑰

图 1a 显示了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认知的得分分布情况,分数越高意味着对西方的估计越好。受访者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认知大致呈正态分布,总分为 1 的人最多。图 1b 显示的是受访者对美国人均收入的认知的分布情况。虽然四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答案(\$40,000)的人最多,仍有过半的受访者高估了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除了这些对社会经济看法的总计得分外,受访者还被分为如下三个类型进行分析:系统性低估西方国家者、大致合理估计西方国家者,以及系统性高估西方国家者。怎样进行这种划分并没有标准的程式可用,但是一个合理的临界值是总分分布的一个标准差。因此,在下面的论述中会将社会经济得分小于等于 -3 视为系统性低估,将得分

^⑭ 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在调查前后发布的报告,美国人均个人年收入 2010 年是 39791 美元,2011 年是 41560 美元。

^⑮ 提供奇数目的选项可能会导致受访者选择中间选项。

^⑯ 另一种办法是把所有低估了西方国家的答案都赋值为 -1,而所有高估了的答案都赋值为 1,而不管高估/低估的程度。此种替代性方法也会得到类似的回归结果。

^⑰ 此种测量显得有些简陋,因为它不能将那些正确回答所有或者绝大多数问题的受访者与另外一些在某些问题上高估西方社会经济状况,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低估西方,但这些错误大致相互抵消的受访者区别开来。但对于社会经济状况而言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受访者是否有一个总体平衡的认知,而不是他或她是否正确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因此对于一项针对该话题的初始研究来说,目前的测量方法是合理的。但是未来的研究需要尽力发展一种更精细的测量方法。

大于等于 3 视为系统性高估, 将剩下的视为大致合理估计。

除了国际性知识和认知以外, 此次调查还有关于近来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十个问题, 包括一些社会丑闻, 以测量受访者的国内知识。调查并未考校受访者的中国社会经济知识, 因为如前所述, 在有关外国社会经济情况的一些问题中已经给出了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 以便给受访者提供一定的判断基准。调查中的控制变量则包括新闻消费、民族自豪感、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个人主义, 以及生活满意度。社会人口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家庭收入和党员身份,^⑩但未包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因为受访者均为大学二年级学生。表 1 是此次大学调查各种变量的概述统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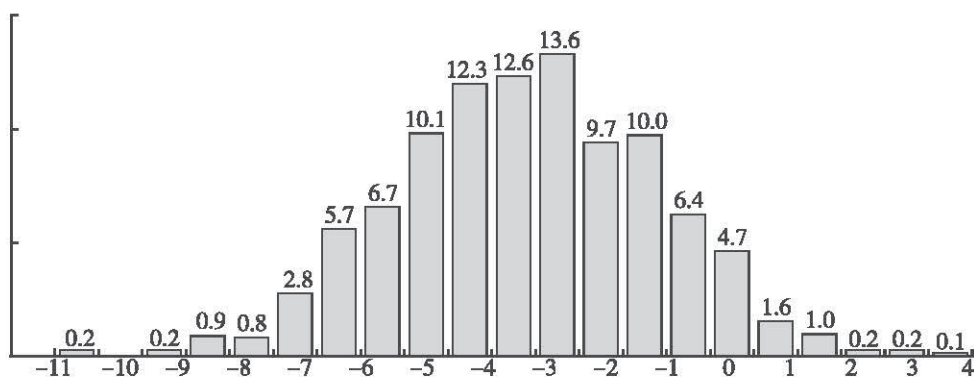


图1a 在线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认知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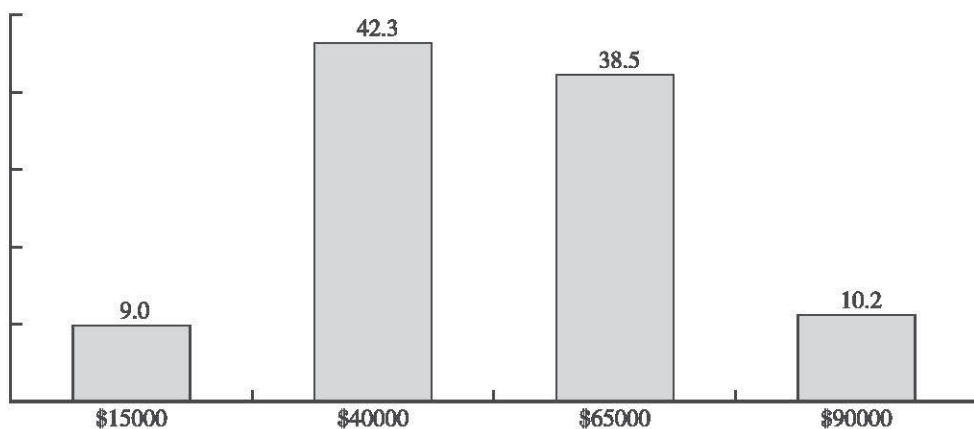


图1b 在线受访者对美国人均收入的估计

^⑩ 因为学生比较年轻, 本调查中预备党员也被视为具有党员身份。

表1 大学调查概述统计量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整体现状	1244	2.97	0.93	1	5
发展前景	1244	3.37	0.99	1	5
政府回应性	1209	3.23	1.05	1	5
政治体制	1243	3.42	1.05	1	5
腐败	1233	4.28	1.41	1	6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1202	0.29	2.98	-11	10
高估	1202	0.24	0.43	0	1
低估	1202	0.17	0.38	0	1
政治知识	1231	4.39	2.13	0	10
国内知识	1229	5.48	1.89	0	10
新闻消费	1209	3.77	1.35	1	5
民族自豪感	1240	3.79	0.91	1	5
内部效能	1213	2.78	1.10	1	5
外部效能	1209	2.03	0.91	1	5
个人主义	1203	2.57	1.83	1	5
生活满意度	1242	3.26	0.98	1	5
女性	1175	0.42	0.49	0	1
家庭收入	1127	4.56	1.59	0	10
共产党党员	1171	0.19	0.39	0	1

4 结果

现在可以考察受访者有关外国的信息与认知怎样与他们对中国的评价相关。考虑到因变量的性质,笔者采用了有序逻辑回归分析(ordered logit regressions)^⑨。表2显示的因变量是对中国的整体评价,其中包括对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针对每一个因变量的两种回归分析分别使用受访者的外国社会经济认知总分和他们是否高估/低估了西方国家来代表他们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

如表2第一列所示,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状况认知越正面的受访者对中国总体情况的评价就越低。第二列显示此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高估外国而发生;就低估外国的情況而言,系数如预期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两列都显示受访者的国际政治知识及国内知识与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显著相关。表2最后两列显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些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认知越正面的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越不乐观。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高估西方国家的受访者中。这再次证明,国际政治知识及国内知识与对本国的评价没有显著联系。

^⑨ 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的结果与此处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表2 对中国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 (大学调查)

	整体现状		发展前景	
	(1)	(2)	(1)	(2)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066*** (0.020)	—	-0.050* (0.020)	—
高估	—	-0.437** (0.140)	—	-0.286* (0.140)
低估	—	0.025 (0.164)	—	0.065 (0.164)
政治知识	-0.049 (0.032)	-0.049 (0.033)	0.009 (0.032)	0.009 (0.032)
国内知识	-0.022 (0.036)	-0.022 (0.036)	-0.037 (0.036)	-0.038 (0.036)
新闻消费	-0.147*** (0.045)	-0.148*** (0.045)	-0.015 (0.044)	-0.017 (0.044)
民族自豪感	0.608*** (0.071)	0.609*** (0.071)	0.689*** (0.072)	0.688*** (0.072)
内部效能	-0.180** (0.057)	-0.183** (0.057)	-0.187** (0.057)	-0.190*** (0.057)
外部效能	0.101+ (0.060)	0.101+ (0.060)	0.156* (0.061)	0.157* (0.061)
个人主义	-0.226* (0.070)	-0.233*** (0.070)	-0.195** (0.069)	-0.201** (0.069)
生活满意度	0.681*** (0.068)	0.682*** (0.068)	0.519*** (0.064)	0.521*** (0.064)
女性	-0.217+ (0.123)	-0.210+ (0.123)	0.107 (0.122)	0.114 (0.122)
家庭收入	0.051 (0.038)	0.049 (0.038)	0.042 (0.038)	0.041 (0.038)
共产党党员	0.262+ (0.150)	0.245 (0.150)	-0.012 (0.150)	-0.021 (0.150)
样本数	1049	1049	1049	1049

注:表中的数字是有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截点几乎总是显著,但这里因篇幅而忽略;***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其他变量如生活满意度、民族自豪感、政治效能和个人主义与本国评价的关系则如预期所料。很自然,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民族自豪感相联系的是更正面的本国评价。此外,个人主义和内部效能则与受访者的本国评价负相关。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威权主义体制,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外部效能则与本国评价正相关。

表3显示了受访者的国际认知与他们对中国政府回应性、中国政治体制以及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价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个因变量都使用了表2中使用的两种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国际认知与本国评价之间的关系不仅反映在对国家的整体评价上,还反映在这些更具体和政治性的领域中: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越正面、越是高估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其对中国政府和政治体制的评价则越低,同时他们也越会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国际政治知识和国内知识与国内评价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控制变量的结果也类似于表2。

表3 对政府、政治体制和腐败程度的评价(大学调查)

	政府回应性		政治体制		腐败程度	
	(1)	(2)	(1)	(2)	(1)	(2)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049 [*] (0.020)	—	-0.067 ^{***} (0.020)	—	0.065 ^{***} (0.019)	—
高估	—	-0.261 ⁺ (0.138)	—	-0.322 [*] (0.140)	—	0.341 [*] (0.135)
低估	—	0.062 (0.158)	—	0.126 (0.159)	—	-0.251 (0.157)
政治知识	0.015 (0.031)	0.015 (0.031)	-0.044 (0.031)	-0.044 (0.032)	0.021 (0.030)	0.017 (0.031)
国内知识	-0.057 (0.036)	-0.058 (0.036)	-0.002 (0.035)	-0.004 (0.035)	0.029 (0.034)	0.031 (0.034)
新闻消费	-0.009 (0.043)	-0.011 (0.043)	0.025 (0.044)	0.022 (0.044)	0.008 (0.043)	0.013 (0.043)
民族自豪感	0.600 ^{***} (0.071)	0.600 ^{***} (0.071)	0.625 ^{***} (0.072)	0.625 ^{***} (0.072)	-0.358 ^{***} (0.067)	-0.358 ^{***} (0.067)
内部效能	-0.075 (0.055)	-0.075 (0.055)	-0.126 [*] (0.056)	-0.127 [*] (0.056)	0.034 (0.054)	0.038 (0.054)
外部效能	0.120 [*] (0.059)	0.120 [*] (0.059)	0.116 [*] (0.059)	0.116 [*] (0.059)	-0.275 ^{***} (0.059)	-0.275 ^{***} (0.059)
个人主义	-0.272 ^{***} (0.068)	-0.276 ^{***} (0.068)	-0.182 ^{**} (0.069)	-0.187 ^{**} (0.069)	0.067 (0.066)	0.068 (0.066)
生活满意度	0.085 (0.061)	0.084 (0.061)	0.215 ^{***} (0.064)	0.21 ^{***} (0.063)	-0.103 ⁺ (0.060)	-0.105 ⁺ (0.060)

续表

	政府回应性		政治体制		腐败程度	
	(1)	(2)	(1)	(2)	(1)	(2)
女性	-0.179 (0.120)	-0.174 (0.119)	0.050 (0.120)	0.056 (0.120)	-0.046 (0.117)	-0.048 (0.117)
收入	0.090* (0.037)	0.090* (0.037)	-0.014 (0.037)	-0.013 (0.037)	-0.067+ (0.037)	-0.066+ (0.037)
共产党党员	0.010 (0.149)	0.009 (0.149)	0.239 (0.149)	0.226 (0.149)	-0.083 (0.144)	-0.078 (0.144)
样本数	1046	1046	1049	1049	1047	1047

注：表中的数字是有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截点几乎总是显著，但这里因篇幅而忽略；***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为了使上述结果在实质上更加清晰，图2根据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预测出他们对中国的综合评价，协变量则都取均值。对中国的综合评价是通过将上述五个独立的因变量合并得来，为了便于解释，其赋值调整为从0到1。^⑨因该综合评价是连续变量，本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出结果。如图2所示，受访者中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最糟糕的受访者的综合本国评分为0.61，但是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最美好的受访者的综合本国评分则为0.45，下降幅度为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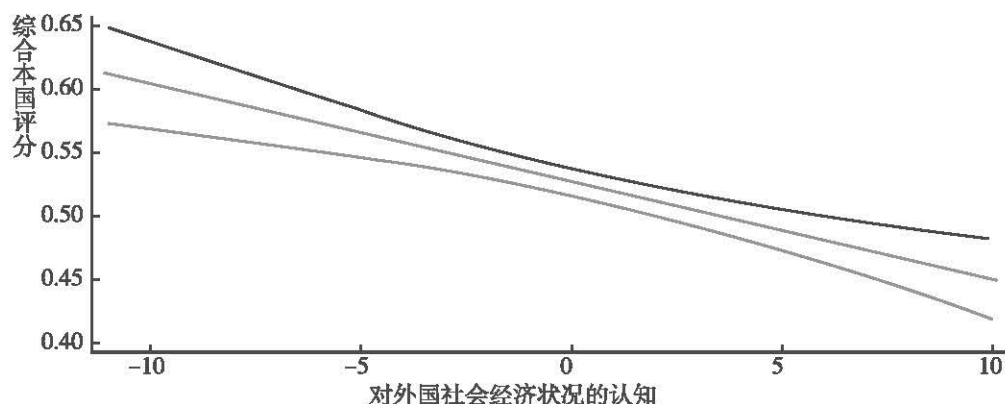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大学生对中国的综合评价预测值

综上所述，本次大学调查的结果与H1和H2一致。最重要的是，受访者尤其是高估了国外社会经济状况的受访者对外国的认知越佳，其对本国和本国政府的评价就越低，这确证了H1。此外，如H2所预料，关于国外常规政治事务的知识与国内评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换言之，国际知识和国内态度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社会经济信息而非政治知识。

^⑨ 五个因变量中的每一个都被重新赋值到0~1之间，其中1代表最正面的评价，因此综合评价变量中对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价的赋值与原先是反向的。

5 研究2：在线实验调查

为进一步考察国际性知识和信息与国内态度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纠正有关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准确认知是否会改变人们对本国的评价，本文在2014年4月用一个背景广泛的网络样本做了一次在线实验调查。^①此次在线实验调查可用来检验大学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适用于特定样本还是更具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实验可以用来检验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是否会在因果上影响人们的国内评价。

5.1 实验设计与参与者招聘

设计本次在线实验调查采用受试者间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至控制组和实验组（纠正组），两组都需要完成一个与大学调查相似的问卷。除此之外，实验组在对外国社会经济问题回答错误后还会得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亦即获得纠正（详见下文）。本次在线实验调查中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与前述大学调查相同的主题，但更新了部分选项，因为世界社会经济状况自大学调查后已发生变化。对国际性政治知识问题同样进行了更新。国内政治和社会知识则在本次实验调查中被去掉，因为前面的研究发现它与国内评价无显著关系。调查还增加了一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②另外，为了控制收入之外的个人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又增加了一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有关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问题。对很多变量的测量量表也进行了更新。^③

本次在线实验调查中的国际政治知识问题包括2013年夏天到2014前期的一些主要事件，以及某些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身份（如法国总统、教皇以及当时去世不久的纳尔逊·曼德拉）。政治事件包括2013年埃及的政变、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闭、泰国和乌克兰的社会抗议与政治危机、爱德华·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计划的披露、叙利亚内战以及朝鲜的政治肃清。与2011年的大学调查相似，这些政治知识题涵盖了不同的地区和议题。但与前述调查的时间段不同的是，对于很多国家而言，2013~2014年显得尤为动荡，因此本次调查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涉及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埃及、乌克兰、叙利亚和泰国的问题都涉及政府更迭、存续以及大量的社会动荡与暴力。这些问题因此可被视为有关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并与

^① 此外，我在2012年9月和2014年10月分别做了其他两个在线调查实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具体参见讨论部分。

^② 这一变量通过受访者对下列陈述的赞同程度来进行测量：“总体上，我们可以信任政府做出的决定。”

^③ 对本国的评价以及生活满意度采用了七分制而非五分制量表，对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估则仍保留了最初的六分量表。

其他关于政治人物以及相对较为常规的政治事务问题区分开。下文中有有关政治稳定的问题和无关稳定的问题既会放在一起也会分开分析。

至于调查的实验部分，当实验组的人回答完所有社会经济问题之后，他们会被告知他们答错的那些问题的正确答案，^⑨ 而控制组的成员则不会得到任何纠正性信息。实验组内所有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错误回答都会被纠正，不管错误是高估外国还是低估外国。但由于低估通常不会对人们的观点形成显著影响（如大学调查所示，也可见下文分析），因此提供正确信息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高估的纠正。因为实验的目的是考察获得正确信息的影响，所以调查中有关社会经济认知的问题以及信息的纠正均置于各种本国评价问题之前（但在政治和社会态度问题如民族自豪感、个人主义和政治效能之后）。因为实验中的政治知识问题并没有涉及信息纠正，所以此类问题被置于国内评价问题之后，这同前述大学调查一样。为防止受访者猜出研究的目的并提供他们认为的符合研究者意图的答案，本国评价问题之前以及调查的其他几个地方放置有与本次研究无关的干扰性问题。

5.2 招聘

在线调查实验的参加者是从一个类似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的热门中国众包网站招聘而来，然后他们被导至美国的一个网站并完成匿名调查。为防止实验中出现重复参加的现象，招聘平台上限定每一个 IP 地址和账户只允许参加一次。

使用众包平台来招募研究参加者在社会科学中正越来越普遍，用这样的参加者能够复制一些经典的以及近来在其他场景中所做的实验（Berinsky, Huber & Lenz, 2012; Buhrmester, Kwang & Gosling, 2011; Sprouse, 2011）。从中国的众包平台招募研究参与者亦已经被用来研究中国的公共舆论（Huang, forthcoming）。如在线附录所示，实验调查的参加者来自各个行业、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全中国各地。尤为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参加者的地域、性别、和职业的分布情况总体上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特征大致相似。学生占参与者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他职业包括了公司员工、政府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士、工人、农林牧副渔从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失业人员。虽然调查实验中年轻人和有大学学历的人的比例总体高于他们在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但调查实验参加者的社会人口特征相比大学生样本则更接近于一般用户。

在线调查实验的一个挑战在于如何确保受访者对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Goodman,

^⑨ 只有两人完全正确地回答了所有八个社会经济问题，他们恰巧都在纠正组。将其从分析中排除并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Cryder & Cheema, 2012), 因此在调查开始时使用了一个指导性操作检验 (Oppenheimer, Meyvis & Davidenko, 2009) 来筛选掉不认真的参加者。^⑤ 最后有 955 名参加者完成调查, 其中 470 名处在纠正组 (实验组) 中。

5.3 结果

图 3 显示了在线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分以及他们对美国人均收入的估计的分布情况。这一分布与大学生受访者的分布类似 (举例而言, 亦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高估了美国的人均收入^⑥), 这意味着本文所显示的中国民众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并不局限于特定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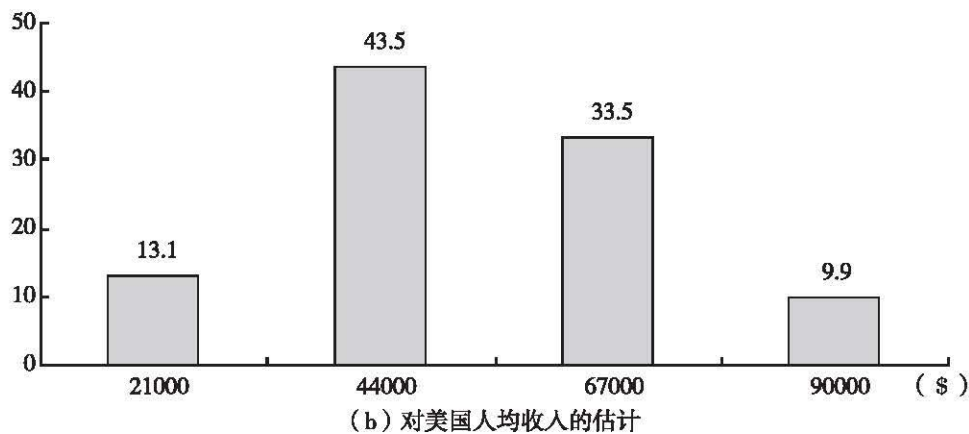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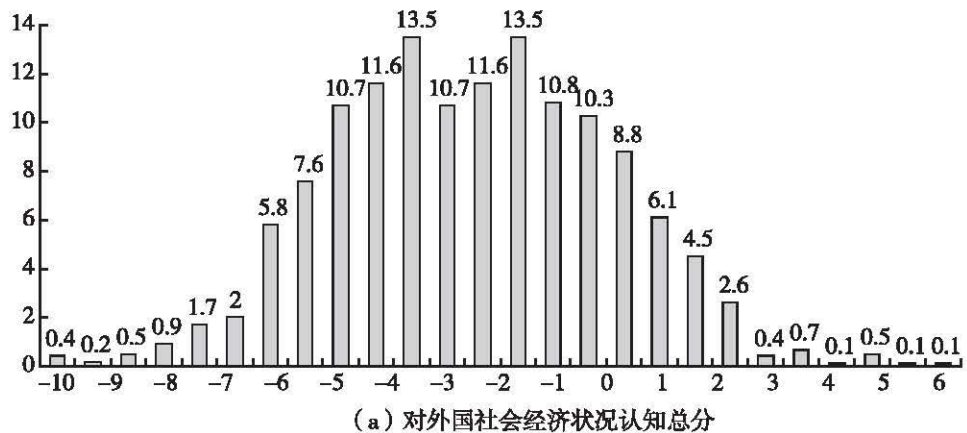


图 3 在线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

^⑤ 具体而言, 调查中比较靠前的一道题看上去和其他问题一样, 但该问题附加说明本身目的, 并要求受访者对该题选择某个特定选项。未选择提示选项的受访者则被导离调查。

^⑥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发布的数据, 2013 年美国的居民人均收入为 44543 美元。

表4显示了在线实验控制组和纠正组的概述统计量和对两组参与者各变量均值进行比较的t检验结果。正如因变量部分所显示,纠正组如预期所料,对中国的评价更加正面,而且这些差别往往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自变量部分则表明随机分组是成功的,因为控制组和纠正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4 在线调查实验的概述性统计量

变量	控制组(N=485)				实验组(纠正组,N=470)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	p值
因变量	—	—	—	—	—	—	—	—	—	—
整体现状	4.26	1.19	1	7	4.33	1.13	1	7	-1.02	0.155
发展前景	5.00	1.23	1	7	5.06	1.13	1	7	-0.67	0.252
政府回应性	4.47	1.50	1	7	4.69	1.38	1	7	-2.31	0.011
政府可信度	4.44	1.44	1	7	4.63	1.40	1	7	-2.10	0.018
政治体制	4.60	1.27	1	7	4.73	1.17	1	7	-1.67	0.048
腐败程度	4.16	1.36	1	6	3.94	1.21	1	6	2.59	0.005
自变量	—	—	—	—	—	—	—	—	—	—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31	3.38	-10	11	0.13	3.09	-10	12	0.87	0.386
政治知识	4.42	2.45	0	10	4.22	2.36	0	10	1.28	0.201
新闻消费	4.05	1.16	1	5	4.12	1.14	1	5	-0.91	0.362
民族自豪感	3.31	0.84	1	4	3.32	0.85	1	4	-0.295	0.768
内部效能	2.63	0.85	1	4	2.70	0.78	1	4	-1.23	0.217
外部效能	1.54	0.72	1	4	1.58	0.70	1	4	-0.88	0.377
个人主义	2.06	0.72	1	4	2.01	0.73	1	4	0.87	0.383
生活满意度	4.19	1.30	1	7	4.17	1.28	1	7	0.23	0.816
女性	0.46	0.50	0	1	0.46	0.50	0	1	-0.06	0.951
年龄组	2.58	0.96	1	7	2.63	0.96	1	6	-0.78	0.436
教育程度	4.34	0.92	1	6	4.43	0.89	1	6	-1.56	0.118
家庭收入	3.63	1.09	1	7	3.63	1.15	1	7	0.07	0.941
社会地位	3.40	1.26	1	7	3.52	1.23	1	7	-1.50	0.133
共产党党员	0.13	0.34	0	1	0.15	0.36	0	1	-0.75	0.452

注:不相等方差独立样本t-检验;应变量p值反映的是单边检验结果,自变量p值反映的是双边检验结果。

虽然表4已经表明纠正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错误信息能够提高他们对本国的评价,为进一步考察国际知识和认知的影响,接下来笔者会如同大学调查一样,

给出有序逻辑回归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的结果。^②

表5显示的是当因变量是对中国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时的分析结果。每个因变量的两个模型分别用参与者对国外社会经济认知的总分和他们是否高估/低估外国来代表他们的认知;模型2也包括信息纠正与高估/低估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对国外的认知越正面,尤其是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人,其对中国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就越低。此外,信息纠正与高估之交互作用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意味着纠正那些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受访者的错误认知提高了他们对中国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最后,与大学调查结果不同的是,政治知识与在线受访者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评价正相关。对于国际政治知识和本国评价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否还会出现在其他情形中,本文将在下面讨论。控制变量尤其是民族自豪感、个人主义和生活满意度与对本国评价的关系则和预期一致,亦如大学调查之结果。

表5 对中国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价 (在线调查实验)

	整体现状		发展前景	
	(1)	(2)	(1)	(2)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055** (0.019)	—	-0.036* (0.019)	—
高估	—	-0.636** (0.203)	—	-0.506* (0.198)
低估	—	0.320 (0.232)	—	0.105 (0.227)
纠正	0.049 (0.121)	-0.055 (0.160)	0.036 (0.120)	-0.089 (0.157)
纠正 * 高估	—	0.543* (0.297)	—	0.598* (0.295)
纠正 * 低估	—	-0.202 (0.323)	—	-0.132 (0.317)
政治知识	0.030 (0.027)	0.032 (0.027)	0.050* (0.026)	0.054* (0.027)
新闻消费	0.078 (0.058)	0.073 (0.058)	0.046 (0.057)	0.045 (0.057)
民族自豪感	0.636*** (0.083)	0.630*** (0.083)	0.610*** (0.081)	0.599*** (0.081)

^② 我还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分析时协变量包括了表4所列的控制变量,得到的结果与有序逻辑回归的结果一致。

续表

	整体现状		发展前景	
	(1)	(2)	(1)	(2)
内部效能	-0.087 (0.088)	-0.089 (0.088)	0.013 (0.088)	0.013 (0.088)
外部效能	0.027 (0.095)	0.025 (0.095)	0.101 (0.096)	0.096 (0.096)
个人主义	-0.377*** (0.092)	-0.376*** (0.092)	-0.381*** (0.091)	-0.392*** (0.091)
生活满意度	0.754*** (0.061)	0.758*** (0.062)	0.311*** (0.055)	0.315*** (0.055)
女性	0.061 (0.125)	0.060 (0.126)	-0.055 (0.124)	-0.051 (0.124)
年龄	0.116+ (0.066)	0.116+ (0.066)	-0.123+ (0.064)	-0.126* (0.064)
教育程度	0.043 (0.071)	0.047 (0.071)	-0.004 (0.070)	-0.003 (0.070)
家庭收入	0.163+ (0.079)	0.167+ (0.079)	0.150+ (0.078)	0.152+ (0.078)
社会地位	0.133+ (0.068)	0.129+ (0.068)	0.125+ (0.067)	0.125+ (0.067)
共产党党员	0.008 (0.176)	-0.000 (0.177)	0.164 (0.170)	0.163 (0.171)
样本数	955	955	955	955

注：表中的数字是有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截点几乎总是显著，但这里因篇幅而忽略；***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表6和表7显示的因变量是对政府回应性、政府可信度、政治体制和腐败程度的评价。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认知越正面的参与者再次展现出对中国更低的评价。同样这个关系主要源于对外国状况的过高估计，这种高估几乎总是导致对中国更低的评价。信息纠正与高估之交互作用的系数符号都“正确”，而且在对政府信任和对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估上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纠正高估者的错误信息常常（但不总是）能提高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评价。在用受访者社会经济题总分来表示他们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且模型中无交互作用变量时，信息纠正的相关系数常常是显著的，且符合预期方向。

表6 对政府回应性和可信度的评价(在线调查实验)

	政府回应性		政府可信度	
	(1)	(2)	(1)	(2)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053 ** (0.019)	—	-0.062 *** (0.019)	—
高估	—	-0.536 ** (0.194)	—	-0.628 ** (0.194)
低估	—	-0.055 (0.217)	—	-0.114 (0.217)
纠正	0.237 * (0.117)	0.142 (0.155)	0.204 * (0.117)	-0.024 (0.155)
纠正 * 高估	—	0.263 (0.291)	—	0.509 + (0.289)
纠正 * 低估	—	0.074 (0.306)	—	0.492 (0.311)
政治知识	0.042 (0.026)	0.044 + (0.026)	0.051 * (0.026)	0.053 * (0.026)
新闻消费	0.063 (0.056)	0.063 (0.056)	0.043 (0.057)	0.042 (0.057)
民族自豪感	0.556 *** (0.080)	0.554 *** (0.080)	0.570 *** (0.080)	0.567 *** (0.080)
内部效能	-0.032 (0.085)	-0.032 (0.085)	-0.050 (0.086)	-0.047 (0.086)
外部效能	0.013 (0.092)	0.005 (0.092)	0.128 (0.094)	0.127 (0.094)
个人主义	-0.544 *** (0.091)	-0.550 *** (0.091)	-0.607 *** (0.091)	-0.615 *** (0.091)
生活满意度	0.277 *** (0.054)	0.278 *** (0.055)	0.245 *** (0.055)	0.243 *** (0.055)
女性	-0.185 (0.120)	-0.171 (0.120)	-0.194 (0.121)	-0.191 (0.121)
年龄	0.136 * (0.064)	0.136 * (0.064)	0.161 * (0.065)	0.162 * (0.065)
教育程度	0.086 (0.068)	0.088 (0.068)	0.100 (0.070)	0.096 (0.070)
家庭收入	0.125 (0.077)	0.129 + (0.077)	0.159 * (0.078)	0.171 * (0.079)

续表

	政府回应性		政府可信度	
	(1)	(2)	(1)	(2)
社会地位	0.006 (0.067)	0.005 (0.068)	0.011 (0.067)	0.007 (0.067)
共产党党员	0.424* (0.168)	0.419* (0.169)	0.258 (0.166)	0.266 (0.167)
Observations	955	955	955	955

注：表中的数字是有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截点几乎总是显著，但这里因篇幅而忽略；***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表7 对政治体制和腐败程度的评价（在线调查实验）

	政治体制		腐败程度	
	(1)	(2)	(1)	(2)
社会经济状况认知	-0.045* (0.019)	—	0.082*** (0.018)	—
高估	—	-0.167 (0.202)	—	0.768*** (0.197)
低估	—	0.210 (0.221)	—	0.079 (0.226)
纠正	0.145 (0.119)	0.225 (0.157)	-0.320** (0.117)	-0.154 (0.154)
纠正 * 高估	—	-0.130 (0.295)	—	-0.530+ (0.286)
纠正 * 低估	—	-0.294 (0.313)	—	-0.142 (0.311)
政治知识	0.060* (0.026)	0.059* (0.026)	-0.006 (0.026)	-0.005 (0.026)
新闻消费	-0.033 (0.058)	-0.038 (0.058)	0.038 (0.057)	0.046 (0.057)
民族自豪感	0.526*** (0.082)	0.533*** (0.083)	-0.328*** (0.080)	-0.327*** (0.080)
内部效能	-0.050 (0.087)	-0.056 (0.08)	0.118 (0.083)	0.122 (0.083)

续表

	政治体制		腐败程度	
	(1)	(2)	(1)	(2)
外部效能	0.129 (0.093)	0.122 (0.093)	-0.159 ⁺ (0.093)	-0.144 (0.092)
个人主义	-0.428 ^{***} (0.091)	-0.423 ^{***} (0.091)	0.305 ^{***} (0.088)	0.316 ^{***} (0.088)
生活满意度	0.195 ^{***} (0.054)	0.198 ^{***} (0.055)	-0.057 (0.053)	-0.055 (0.053)
女性	-0.174 (0.123)	-0.169 (0.12)	0.023 (0.122)	0.012 (0.121)
年龄	0.010 (0.065)	0.012 (0.065)	0.170 ^{**} (0.063)	0.164 ^{**} (0.062)
教育程度	0.119 ⁺ (0.069)	0.120 ⁺ (0.070)	0.105 (0.068)	0.108 (0.068)
家庭收入	0.302 ^{***} (0.078)	0.297 ^{***} (0.078)	-0.108 (0.076)	-0.104 (0.076)
社会地位	0.031 (0.066)	0.033 (0.066)	-0.049 (0.065)	-0.055 (0.065)
共产党党员	0.334 ⁺ (0.171)	0.321 ⁺ (0.171)	-0.257 (0.169)	-0.254 (0.170)
样本数	955	955	955	955

注：表中的数字是有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截点几乎总是显著，但这里因篇幅而忽略；***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在表6与表7中，除腐败问题之外，国际政治知识同样与对中国的评价正相关。正如之前探讨过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本次在线调查实验中的十个政治知识问题中有好几个是关于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而中国民众对社会稳定有着众所周知的偏爱。为验证此种可能，本文分别用受访者在涉及政治不稳定和无关稳定问题上的得分来替换政治知识总得分进行分析。表8采用包含了高估/低估与纠正之交互作用的模型来比较涉及政治不稳定的问题与无关政治稳定的问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②

表8 有关社会稳定的政治知识题与无关社会稳定的政治知识题

整体现状	发展前景	政府回应性	政府可信度	政治体制	腐败程度
有关问题(4)	—	—	—	—	—
无关问题(6)	—	—	—	—	—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表示不显著。

② 以社会经济认知总分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如表 8 所示, 就对发展前景、政府回应性、政府可信度和政治体制的评价而言, 有关政治不稳定问题的知识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而无关政治稳定问题的知识仅在对政治体制的评价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将表 8 与表 5、表 6 和表 7 进行比较, 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知识的此种显著性主要源于有关政治不稳定的知识, 这确证了 H4。但是无关政治稳定问题的知识与受访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也呈 (轻微) 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颇有意思, 并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同大学调查,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的实质性影响, 图 4 描绘了以受访者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为基础的对中国的综合评价, 其中协变量都取均值。^② 本次线上调查样本中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最负面的受访者的综合国内评价的得分为 0.64, 而对外国社会经济认知最正面的受访者的综合国内评价的得分则为 0.49, 下降了将近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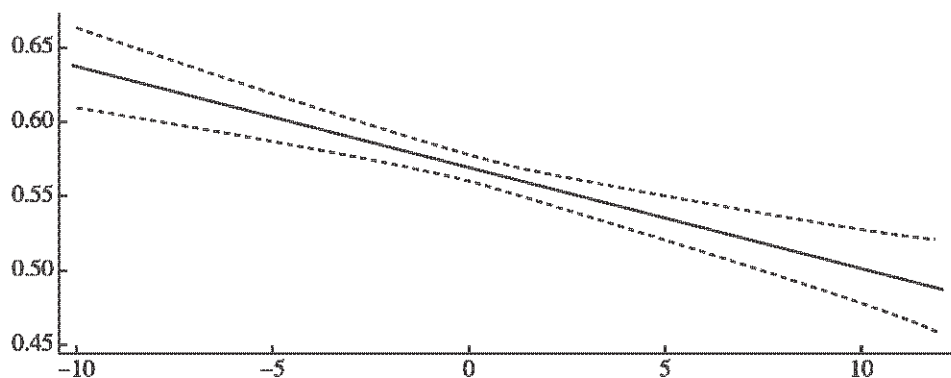


图 4 在线受访者对中国的综合评价预测值

为了进一步显示高估以及信息纠正的影响, 本文根据受访者是否系统地错估了外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是否得到信息纠正把他们分成不同组别进行比较。在图 5 中, 第 1 组为既未系统高估亦未系统低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受访者, 这些受访者同时没有得到信息纠正 (基准组)。第 2 组为低估了外国社会经济状况但并未得到纠正的受访者, 第 3 组是低估了外国社会经济状况但得到纠正的受访者。第 4 组是高估了外国社会经济状况但未得到纠正的受访者, 第 5 组是高估了外国社会经济状况但得到纠正的受访者。黑点为预测值, 括号内是 95% 置信区间。如图 5 所示, 第 1 组、第 2 组和第 3 组对中国的综合评价相似, 但第 4 组 (高估的受访者) 对中国的综合评价则显著低于前三组。第 5 组对中国的综合评价则又接近基准组, 这意味着对高估者的错误信息进行纠正将会使他们对本国的评价回归到更加“正常”的水平。

^② 图 2 中, 综合评价是各项单独国内评价变量之和, 其中每个变量都被重新赋值为 0 到 1。结果基于 OLS 回归分析, 综合评价的赋值也重新调整为从 0 到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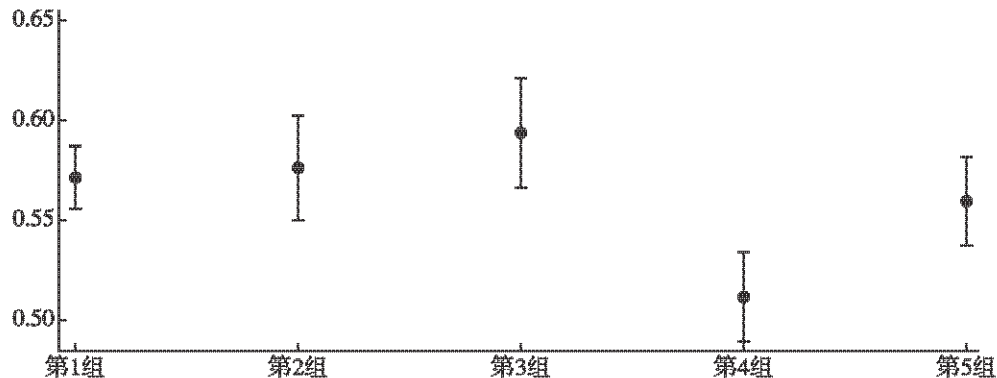


图5 高估和信息纠正的结果

这些背景多样的网络样本的结果不仅说明了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与对国内评价这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相当稳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更正面的认知能在因果关系上导致更低的国内评价,而纠正对外面世界的过高估计会提高受访者对本国的评价,因此H1与H3都得到了验证。至于政治方面的知识,如H2和H4所预设的那样,对国外常规政治事务的熟悉程度通常与个人对国内的态度并不显著相关,但对外国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更了解的人则常常对本国会有更高的评价。

7 讨论

本节讨论对此项研究可能会有的一些顾虑,并将研究结果与其他相关文献做进一步联系。就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与更低的本国评价之间的联系而言,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可能为反向因果关系:那些对本国评价更低的人有可能倾向于寻找或是更加注意正面描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并忽略相关的负面信息(Huang和Yeh, 2015),这种选择性信息获取可能会导致对外国的认知变得过于浪漫。就社会和政治性问题而言,动机性推理和选择性信息获取在某些情形下已经为人熟知(Iyengar和Hahn, 2009; Taber和Lodge, 2006)。尽管这种现象也可能对国际认知与国内态度之间的关系产生作用,此前笔者已经论述过中国的信息环境颇为无序与混乱,社会上流传着大量的不准确信息。很大程度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信息是比较偶然的、随机的。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中的在线调查实验就是用来检验上述因果关系的。如果说对外国过于美好的认知与民众对本国更低的评价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少部分程度上是前者导致后者,一个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纠正不实认知将会提高人们对本国的评价。如果因果的方向完全是从对本国的态度到对外国的(不实)认知,纠正关于外国的错误信息对人们对本国的评价将没有太大影响。实际上,动机性推理者在遇到与他们预想不一致的信息

时将会坚持甚至加强他们此前固有的看法和信念 (Redlawsk, 2002; Taber and Lodge, 2006)。本研究中调查实验的结果则完全不同: 纠正那些高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受访者的认知通常能够提高 (且从未降低) 他们对本国的评价。因此, 因果关系的方向至少部分是从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更正面的认知和过高估计到更低的对本国的评价。

本文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是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使用学生样本和在线样本而不是全国性代表样本是有原因的。首先, 这是文献上关于国际性知识和信息对个人国内观点影响的首次研究, 目前尚无具备全国代表性且包含了直接测量受访者国际性社会经济认知的数据可用。其次, 也可能更重要的是, 考虑到当前中国制度和技术上的限制, 全国性的分层抽样不可避免地涉及面访, 这对于受访者评价中国的政府、政治体制和腐败这样的政治敏感问题而言将会是个麻烦。采用学生校本和在线样本进行匿名调查将会使受访者在回答问题时更加坦诚。最后, 本文调查的大学在中国大学中具有典型性, 在线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则在多个关键维度上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特征非常接近。尽管本研究的样本群体相对中国总体人口而言比较年轻, 但是年轻且熟知互联网的人们在政治上也会更活跃, 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最后, 除了上述提及的大学调查和在线调查实验以外, 本文还在 2012 年 9 月和 2014 年 10 月分别做了其他两个在线调查实验。2012 年的实验规模是上述实验的一半左右, 但在社会经济认知与信息纠正问题上得出了类似结论。^③ 2014 年 10 月的调查去掉了所有社会经济信息问题中对应的中国统计数据 (如前所述, 提供这些数据可以给受访者一个判断的框架)。^④ 省略这些基准性参考信息显著地增加了受访者回答的随机性错误,^⑤ 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与对本国的评价之间的基本关系仍然成立: 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知越佳、越是高估了外国的人, 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评价通常就越低, 而且纠正对国外的过高估计经常导致对国内评价的提高。四年间 (2011 ~ 2014 年) 多轮调查和实验均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这可以增强对本文结论的信心。

对此研究还有一个可能的疑虑是信息纠正可能会让受访者对自己所有的观念都少了一些确信, 并导致他们就国内评价寻找更加稳当和温和的观点。有两个结果能够缓

③ 2012 年的调查实验并不包括国际政治知识问题。

④ 另外, 这次调查还用同意还是不同意“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好”这一陈述来替换此前调查中的“民族自豪感”这一变量。

⑤ 另一个可能影响 2014 年 10 月的受访者对社会经济问题回答的因素是这次调查时值“周小平”事件意外发生。周小平是个原先并不广为人知的网络写手, 但其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被习近平主席公开表扬后瞬间火了起来, 中国官方媒体对他予以了大幅度的宣传。与那些流行于网络常常过分美化西方生活的帖子不同, 周的文章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并以过度凄凉之笔描绘美国生活。上述高级别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 中国的互联网充满了对周小平言论的争议 (Hui 和 Wertime, 2014; Yang, 2014)。这些官方宣传和网络争议很可能会影响受访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 但有关他国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这种讨论在中国会变得如此炽热, 以至于政府感到有必要针对这样的话题开展宣传运动, 这恰恰显示了有关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讨论在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关键地位。

解此种担忧。第一，信息纠正提高了高估外国的受访者对本国的评价，但这只限于某些领域而非所有领域。比如说，信息纠正能够提高他们对中国的整体评价，但在某些政治评价领域这并无影响。这很值得注意，因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表述是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当前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且正在引领国家前进并追赶西方。如果信息纠正会使受访者降低对自己所有观点的确信度，考虑到政治正确问题，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评价的提高度应该大于对中国整体评价的提高度，但是实验的结果并非如此。第二，纠正并未改变那些低估外国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评价，与上述疑虑（即信息纠正让受访者对其所有观点少了一些确信）相左。因此，实验的结果真实反映了受访者的哪些观点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

至于政治知识，有人或许会说对近期事件和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并非唯一重要的信息。^③ 比如说，测量对国外公民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认知将更契合本文对社会经济信息的测量。但如前所述，本文所采用的对政治知识的测量方法是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而且我们亦可认为有关全球性政治事务的知识与对外国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熟悉度相关，也与对外国民主体制如何运行的知识相关。不过毫无疑问，政治知识并非仅指对政治事件和领导人的熟悉程度，在未来的研究中确实需要探索其他的测量办法。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不满和社会经济期盼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亦会有所变化。^④ 换言之，本研究意在引发学界对社会经济信息以及国际性认知的关注；国际性政治知识的影响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考察个人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认知与其对本国态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中国公众的总体国内认可度。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两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国内形势的满意度均低于很多常被引用的中国公众调查，这些调查通常发现很高比例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总体情况和政府体制表示满意。例如，在2008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92.7%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中央政府“非常”有信心或是“相当”有信心。在2011年亚洲晴雨表针对中国大陆的调查中，76.7%的受访者表示“对我们的政府体制感到非常自豪”。在2012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中，82%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我国当前的形势感到满意”。而在本研究的两次调查中，受访者（不包括纠正组）的平均评价仅略高于测量范围的中位数。如在大学调查中，仅分别有29.6%、41.6%和51.0%的受访者对国家的整体现状、政府回应性和政治体制表示满意（包括“有点满意”）。除了本研究所涉调查的匿名性以外，这些结果上的不同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年轻人更多，他们通常更具有全球化意识。虽然年轻一代通常比他们父辈年轻时生活得更好，

^③ 不过以 Barabas 等（2014）的划分为参照，本项研究的调查既包括监控性问题也涉及静态问题。

^④ 另外，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和繁荣时，低估外国社会经济状况或许会比高估影响更大。

但是外国的情形可能在他们心目中也更具分量，因此导致了他们对本国更低的评价。

如前所述，目前考察国际性信息和认知对民众观点之影响的研究付之阙如。不过，对外国媒体在威权国家的影响的研究与本文有些联系。对于这一话题，主流观点多基于定性证据，认为西方媒体通过培育亲民主和亲西方的价值观以及通过用外界信息来对抗政府宣传，对前威权国家的民主化贡献良多（Nelson, 1997; Puddington, 2000）。另外，Kern 和 Hainmueller（2009）考察了解密后的前东德民意调查数据，发现那些能够接收到西德电视信号的东德公民对东德政府更加支持。但是，他们将此影响主要归因为西德电视台更丰富的娱乐节目为东德的民众提供了放松的机会，而不是增加了东德公民对西方“阴暗面”的认知。在 2004 年针对中国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意识和态度的一份全国性调查中，Whyte（2010）发现接触非官方信息越频繁的人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负面评价越少（其接触非官方信息指数包括了与他人讨论当前时事、从外媒和电影获取信息、国内和国际旅游以及对互联网的使用）。Chu（2013）则基于 2008 年亚洲晴雨表调查报告了类似的情况：那些与国际性信息接触更多的中国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也更高。^⑤ 除此之外，一些案例研究也显示，中国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受过良好教育并熟悉外国媒体（Osnos, 2008; Yang 和 Zheng, 2012），这与认为他们只是被国内宣传洗脑的传统观点相左。

那么，外媒到底是稳固了还是动摇了威权统治？处理这一争论的一个办法是认识到媒体给受众提供了包含信息、价值以及娱乐的不同内容，而这些不同的内容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与把所有媒体内容混于一个黑盒之中不同，本文着重关注有关外国的信息，也因此对理解在威权制发展中国家外媒在信息问题上有何潜在影响有所帮助。前述段落中讨论过的一些研究发现对于那些研究的作者们来说颇为出乎预料，但通过本文则能得到很好的解释。除此之外，一些跨国移民研究发现移民至更发达的国家有时会提升移民者对自己原先国家民主运行状况的满意程度（Careja 和 Emmenegger, 2012），降低他们对新国家的制度的信任（Adman 和 Stromblad, 2011），增加他们的物质收入但减少他们的幸福感（Stillman et al., 2015）。虽然这些研究并未直接测量国际性知识，亦未告知我们欠发达国家中大多数无移民经历的民众的观点，但这些研究结果，即发达民主国家的经历常常并未达到移民们的高期望值，与本文的发现相互补充。

^⑤ 但是以上两位作者均未对他们的发现予以解释。他们的分析结果亦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他们的国际接触指数包括了诸如使用互联网、国内旅游和观看外国电影这样的事情，这些与获取外国更多的信息并非等同。例如，在中文互联网上误导性信息相当普遍，因此对于那些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人而言，很难说他们是获知更多还是被误导更多。而从好莱坞电影获得的有关美国的印象恐怕也会与阅读新闻或是真正到访这个国家有很大区别。

8 结论

本文探究了中国民众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认知与他们对本国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认知更佳特别是高估外国的人，其对中国的整体现状和发展前景评价更低，对中国政府的回应性、可信程度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的评价也更低。此外，这些民众更会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这个现象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一种因果关系，即纠正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高估往往能提高人们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评价。

另外，有关外国的一般性政治知识，即对常规政治事务和政治人物的了解，通常对一个人对本国的评价不产生显著影响。这暗示国际性知识对中国公民国内态度的影响更多的是社会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对外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熟悉则与对中国的评价正相关。这反映了中国民众对社会稳定所众人皆知的偏爱，但也与本文隐含的发现相关，即当下中国公民优先考虑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政治赋权，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相关。

高估外国常导致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更低的评价，这个关系看似很平常，却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得到因果关系上的翔实阐述。除此之外，本文还有些概念上的贡献。第一，现有有关公民知识的文献着重关注国内知识，本文则揭示了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认知对塑造公民意见也非常关键。第二，现有文献主要致力于政治知识研究，本文则显示有关社会经济的认知对人们政治态度的影响也很重要。事实上，在威权制发展中国家，有关外国的知识非常关键，相关的社会经济认知对民众国内评价的影响超过了政治性知识。第三，在研究公民信息和知识时，学者们不仅需要区分信息匮乏和信息错误，还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信息错误：高估现实情况与低估现实情况。将这两种不同的信息错误混同视为信息匮乏将会混淆不准确信息的影响。

本文的一个目标是推动对国际知识与国内态度和政治支持之间联系的进一步研究。对未来的研究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来自中国的证据在变迁社会中有何代表性。前文提到过的移民研究，以及一些有关（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常常着迷于西方社会经济生活并渴望美国物品的常见轶事都暗示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非只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国家。不过为了准确回答上述问题，还需要对其他国家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通过研究世界上最大的、有时候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典范的威权国家，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研究威权制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性知识和观念还能揭示这些国家民意的一些重要且微妙之处，而它们往往很难通过直接的民意调查测量得到。例如，对于威权社会中的民意，传统观点集中于人们的政治困境而不是社会经济诉求。毫无疑问，社会经济

与政治都是人们偏好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在针对公民偏好的直接调查中可能很难衡量二者谁更重要。通过研究人们是怎样理解外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以及此种理解会如何潜在地影响他们对本国的看法，可以获知有关公民愿景的重要信息。换言之，民众有关外国的知识、信息和认知至今属于尚未探究的领域，未来在此可产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Per Adman and Per Strömblad, "Utopia Becoming Dystopia? Analysing Political Trust among Immigrants in Sweden," *Swedish Institute for Future Studies Working Paper* 10.

John Aldrich, Jie Lu and Kang Liu, "How Do Americans View the Rising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2015).

Jason Barabas, Jennifer Jerit, William Pollock and Carlisle Pollock, "The Quest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2014).

Ellen Barry. "A Hunger for Tales of Life in the American Cul-de-Sac."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2.

Larry M Bertels, "Uninformed Votes: Information Effect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996).

Adam J. Berinsky, Gregory A. Huber and Gabriel S. Lenz, "Evaluating Online Labor Market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Amazon.com's Mechanical Turk," *Political Analysis* 3(2002).

Timothy J. Besley and Anne C. Case, "Incumbent Behavior: Vote-Seeking, Tax-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995).

Eli Bildner, "Chinese Web Users Marvel at Detroit, Where a Home Is as Cheap as a Pair of Shoes," *Tea Leaf Nation*, March 22, 2013, <http://www.tealeafnation.com/2013/03/chinese-web-users-marvel-at-detroit-where-a-home-is-as-cheap-as-a-pair-of-shoes/>.

Lisa Blaydes, *Elections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Mubarak's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chael Buhmester, Tracy Kwang and Sumel D. Gosling,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A New Source of Inexpensive, Yet High-Quality, Data?"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011).

Romana Careja and Patrick Emmenegger, "Making Democratic Citizens: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o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7(2012).

Chen Jie,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ina Review* 1(2013).

Michael Coppedge and John Gerr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A New Approac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2011).

Henk Dekker and Jolanda Van der Noll, "Attitudes towards the EU among Chinese Urban Citizens," in Lisheng Dong, Zhengxu Wang and Henk Dekker, ed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outledge, 2013).

Delli Carpini Delli, X. Michael and Keeter. Scott,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ickson, Bruce J. Dickson, Mingming Shen and Jie Yan, "They Have Issues: Public Goods and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 *Mimeo*, 2013.

Lisheng Dong, Zhengxu Wang and Henk Dekker, ed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outledge, 2013).

Duch, Raymond M. Duch, "Tolerating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Support for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1993).

Raymond M. Duch and Randy T. Stevenson, *The Economic Vote: Ho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Condition Election Resul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rew Dugan 2014. "Americans View China Mostly Unfavorably," http://www.gallup.com/poll/167498/americans-view-china-mostly-unfavorably.aspx?utm_source=WWW&utm_medium=csm&utm_campaign=syndication.

Richard A. Easterlin,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 (1995).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2 (1954).

Barbara Geddes, and John Zaller, "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989).

Martin Gilens, "Political Ignorance and Collective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 (2001).

Joseph K. Goodman, Cynthia E. Cryder and Amar Cheema, "Data Collection in a Flat World: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Mechanical Turk Sampl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3 (2012).

Peter Hays Gries, H. Michael Crowson and Huajian Cai, "When Knowledg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Contact, Media Exposure,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 (2011).

Han, Donglin and David Zweig, "Images of the World: Studying Abroad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hina Quarterly* 202 (2010).

Richard K. Herrmann, James F. Voss, Tonya Y. E. Schooler and Joseph Ciarrochi,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 (1997).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 - 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 (1995).

Kurt R. Hesse "Cross - Border Mass Communication from West to East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1990).

Marc J. Hetherington, "The Media's Role in Forming Voters' Nat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s in 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996).

Huang Haifeng, "A War of (Mis) Informatio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Rumors and Rumor Rebuttals in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Forthcom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Huang Haifeng and Yao - Yuan Yeh, "Foreign Media, Selective Exposure, and Opinion Change in China," *Working Paper* 2015.

Ning Hui and David Wertim. "Is This the New Face of China's Silent Majorit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1, 201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10/21/is_this_the_new_face_of_chinas_silent_majority.

Shanto Iyengar and Kyu Shahn, "Red Media, Blue Media: Evidence of Ideological Selectivity in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00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79 (200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Daniela Stockman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A. Keohane, eds.,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k Andreas Kayser and Michael Peress, "Benchmarking across Border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2012).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 - 192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olger Lutz Kern and Jens Hainmueller, "Opium for the Mass: How Foreign Free Media Can Stabilize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litical Analysis* 4 (2009).

James H. Kuklinski, Paul J. Quirk, Jennifer Jerit, David Schwieder and Robert F. Rich, "Misinformation and the Currency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Journal of Politics* 3 (2012).

Andrew Lam, "Vietnam's Love Affair,"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5, 2016),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6/nov/15/opinion/oe-lam15>.

Cheng Li, "Shap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Foreign Educated Returnees," *Asia Policy* 10 (2010).

Arthur Lupia and Mathew D. McCubbins, *The Democratic Dilemma: Can Citizens Lear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rol B. Magaloni and Robert B. Albritton, "Changing National Images: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1984).

Adam Magaloni and Joshua Tucker, "A Dynamic Model of Protest: People Power or a One Shot De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013).

B. R. Myers, *The Cleanest Race: How North Koreans See Themselves and Why It Matters* (Melville House, 2010).

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ephen P. Nicholso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Ballot Proposition Aware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2003).

Daniel M. Nicholson, Tom Meyvis and Nicholas Davidenko, "Instructional Manipulation Checks: Detecting Satisficing to Increase Statistical Pow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 (2009).

Evan Osnos, "Angry Youth: 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 *The New Yorker*, July 28, 2008.

Benjamin I. Page and Tao Xie, *Living with the Dragon: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Views the Rise of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 - But Many See China Becoming World's Leading Power,"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7/Pew-Research-Global-Attitudes-Project-Balance-of-Power-Report-FINAL-July-18-2013.pdf>.

Markus Prior, *Post-Broadcast Democracy: How Media Choice Increases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Polarizes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

David P. Redlawsk, "Hot Cognition or Cool Consideration? Testing the Effects of Motivated Reasoning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s* 4 (2002).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and Christian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and Neil Munro, *Popular Support for an Undemocratic Regime: The Changing Views of Russi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ehdiand Dan Bernhardt. Shadmehr, “Collective Action with Uncertain Payoffs: Coordination, Public Signals and Punishment Dilemm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 (2011).

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 – 19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4 (2011).

Tianjian Shi, Jie Lu and John Aldrich, “Bifurcated Images of the US in Urba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Media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 (2011).

Richard H. Smith, “Assimilative and Contras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Upward and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s,” In Jerry Suls and Ladd Wheeler,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Research* (Springer, 2000).

Jon Sprouse, “A Validation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for the Collection of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1 (2011).

Steven Stillman, John Gibson, David McKenzie and Halahingano Rohorua, “Miserable Migrants? Natural Experiment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World Development* 65, 2015.

Samuel A. Arthur, A. Lumsdaine, Marion Harper Lumsdaine, Robin M. Williams, M. Brewster Smith, Irving L. Janis, Shirley A. Star and Leonard S. Cottrell, *The American Soldier: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Charles S. Taber and Milton Lodge, “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2006).

Wenfang T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chor Books, 1955).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elknap Press, 2011).

Want China Times, Staff Reporter, “Offers of USMYM1 Houses in Detroit Lure Na? ve Chinese Buyers,” *Want China Times*, March 22, 2013, <http://www.wantchina.com/news-subclass-cnt.aspx?id=20130322000007&cid=1202>.

Ladd Wheeler and Kunitate Miyake, “Social Comparison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1992).

Martin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Hengjun Yang, “In Defense of Zhou Xiaoping,” *The Diplomat*, November 5,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1/in-defense-of-zhou-xiaoping-chinas-patriotic-blogger/>.

Lijun Yang and Yongnian Zheng, “Fenqing (Angry You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76 (2012).

Jean Yung, “Indian ‘Immigration Bureau’ Thrilled Chinese Internet With Tales of Democracy, Free Trai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Real Time Report*, August 29, 2011.

John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 (2009).